

关于温州金融改革发展的调查

余运德

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我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挂职锻炼。在此期间,走访了温州市金融办、人行、温州银行、市国资委、浦发银行、鹿城农村合作银行以及洞头县的几个金融部门,着重就温州的金融改革创新与发展作了调研,确实受益匪浅,启示甚多。

一、温州金融改革发展的主要举措

在温州考察,会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金融特别发达。温州金融界凭着“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不断探索,改革创新,创造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全国第一”:第一个利率改革的试点,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第一家私人钱庄,最早一批发展资金拆借市场、地方证券市场、民间借贷市场、民营金融机构和典当商行,第一个开展国有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率先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引进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产品丰富多彩,金融市场异常活跃。

一是率先在全国推行金融综合改革。温州是全国第一个开展利率浮动改革试点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产生大量资金需求,同时由于当时的利率管理机制缺乏灵活性,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能力有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1983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自发开始利率浮动,即试行“以贷定存、存贷利率浮动”办法,此举大胆推行之后,获得明显成效,一举摘掉了连续26年亏损的帽子。1983年开始,温州逐步推广这一做法,1987年,温州被央行总行正式确定为全国利率改革试点城市,2002年原人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后,正式确定温州为全国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从而拉开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创新、农村信用社全面改革的序幕。利率改革带来的两大政策尤为明显:一是以利率浮动为资金价格杠杆,引导社会资金合理配置;二是以利率浮动为收入分配手段,调节资金供求双方的收益或成本。这项改革取得的突出成果是:有效组织资金,壮大了银行、信用社的资金实力;平抑了民间借贷利

率;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量;激活了金融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业务的迅猛增长;增强了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的利率市场化意识;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温州经济总量已连续12年稳居浙江省第三位,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的1.35亿元增至2008年的300多亿元,年均递增20.4%。当前,温州新一轮利率改革已进入向市场化迈进的关键阶段,他们正努力探索并最终实现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和债券)利率随市场供求而波动,形成了利率结构(包括风险结构、期限结构)的多样性。

二是大胆推进一系列金融产品创新。温州的金融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创新产品,增强了温州银行业的竞争力,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灵活多样的融资渠道。首先是创建了“三包一挂”贷款模式,即包贷款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按期收回,贷款收益与信贷人员收入挂钩,这种模式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和及时推广。其次是提出了“信贷五要素管理法”,避开可能失真的企业财务报表,突出对企业法人代表品行、自有资金比率、销售贷款归行率等的考察,形成了非常适合温州民营经济特色的贷款管理模式。第三是个人外汇买卖业务的推出。温州是侨乡,海外侨民多、国外创业人士多、资金流量大,这项业务推出后深受温州侨乡人的欢迎。另外还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如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出租车营运权证抵押贷款等这些贷款新品种的创新,都强有力的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温州的金融创新,还表现在金融服务的多样性上。现阶段,温州地区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服务的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信用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产权交易以及民间借贷等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以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极少。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出现过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机构或组织,包括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其他名义的设备租

赁公司,甚至一度出现了地下钱庄、各种互助会、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部、老人协会等,后一类机构属于“过渡型金融组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虽不能健康成长和长期存在,却为政府部门和理论探讨如何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分析素材。现在正规的金融组织已占据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

温州的金融创新,在较高起点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寻求更新更好的发展之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长期性问题,他们正在尝试设立一种新型的融资性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民营投资金融的巨大热情引导好、规范好。同时巩固和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着力解决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发挥好行业协会、融资性服务公司的优势和作用。

三是注重强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温州注重大力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主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率先建立同业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发展地方民营法人小金融机构,突破了资金地区封闭的局面,使得信贷资金可以横向调剂,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986年,温州成立的全国首创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被誉为全国首批“民间银行”;温州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有效满足侨乡居民正当外汇需求,抑制了外汇黑市活动。温州还大力整顿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开展信用体系建设,政府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逃废债活动,维护金融债权;率先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期监测制度,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投向;大力开展诚信体系建设,率先开展市场化企业资信评级。目前,温州已连续两年被中科院金融研究所评为全国金融生态环境五个1级城市之一。尤其是温州市委、市政府近年提出了“信用温州、诚信立市”的建设目标,使社会信用环境逐步优化,区域性金融信用环境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持续提高,保持在优良水平。至2008年年底,全市

贷款不良率在0.80%以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8年实现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二是随着打击逃废债力度的不断加大,恶意逃废债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信用卡恶意透支现象也在明显减少。三是老百姓对金融“三乱”危害性认识明显提高,社会金融秩序进一步好转。四是信用中介组织建设开始起步,进一步完善了信用体系。这些都为设立新型融资性公司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温州金融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温州金融业发展突飞猛进,金融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提升了当地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温州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度增长,金融结构日趋健全,金融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金融对当地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大大增强,为处于经济高增长的温州奠定了坚实和厚重的基础。

一是金融规模快速扩展。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8年,温州市各项存款从1.79亿元增加到4036亿元;各项贷款从5.09亿元增加到3188亿元;保险业从1980年起步到2008年,保费收入从74.8万元增加到52亿元;证券业经营收入2008年近20亿元。

二是金融体系进一步健全。改革之初温州只有一家人民银行,目前全市市级金融机构60家,其中银行机构19家、证券机构8家、保险机构31家、期货公司2家,从业人员数万人,温州已成为全国金融机构较为齐全的地级城市之一。

三是金融服务不断提升。人民银行“金卡工程”温州模式的成功建立,电子联行天地对接系统、现代化支付体系初具规模,“一户通”电子缴税系统全面上线,农民工卡、公务员卡等非现金结算工具的推广,都大大提高金融电子化服务水平。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电子银行、金融超市、网上银行业务不断创新,适应和满足了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多层次需求。

四是金融业效益日益提高。随着温州经济金融良性互动,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银行业收益不断提高,不良资产逐年下降。2008年,资产利润率达到1.45%,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对温州的GDP增长贡献率超过7%。金融机构实现全行业普遍盈利,其中温州银行2008年税收贡献3亿多元,许多银行在全国金融系统考核中名列前茅。今年温州全市平均不良贷款率只有0.71%,信贷资产质量可与金融发达国家相媲美。

三、温州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

通过深入调研,我深刻感受到温州金融业发展质量明显优于全国,金融生态环境被评为全国最高等级的1级城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金融改革,极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量,强化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引导了民间融资并成功防范了风险,资金跨区域流通程度逐步加深加速,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和谐、共赢的发展局面。

(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温州金融业准确且深刻地把握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内涵,凭着“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精神,始终把改革和创新作为推动区域金融发展的最有力武器。从自发开始的利率浮动,到正式成为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到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最好的城市之一,温州金融业走出了一条从自发到自觉,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的发展之路。

(二)有效监管,防范风险是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金融体制就当前而言实际是“放”与“管”的问题,“放”到什么程度必须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近年来温州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在改革创新的同时,注重加强监管,防范和化解风险,很好的把握了“放”与“管”的度,既没有一“管”就死,也没有一“放”就乱。从清理整顿“两社一会”,联合打击逃废债,到开展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到加强民间金融监测指引,无不为温州金融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立足当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金融的使命。温州经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决定了温州金融业必须创造出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来适应和服务于当地经济。温州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温州金融业不断调整、适应和优化结构的过程。目前,无论从金融资源配置、服务对象结构、金融产品创新,都很好地实现了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使命,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局面。从温州信贷总量上看,年均增长24%,领先GDP增长约5%;从金融资源配备来看,目前全部贷款余额中,80%贷给了民营经济和個人,这与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的地位相符合;从信贷模式上看,创造了“五要素管理法”、企业联保贷款、品牌抵押贷款等一系列适合温州经济特色的金融新产品。

(四)二元并存,资金相互交融是金融发展的鲜明特点。温州金融近年来改革创新的一大特色是,体制内外两个市场的并行发展,即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正规金融和以集资、民间借贷为主的传统金融市场二元并存结构,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与当地个体私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起到了补充融资、风险投资和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作用,二者你进我退,资金相互交融,目前大致比例为8:2。

(五)培养人才,提高素质是健康发展的基础。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既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更是人才密集型行业。温州金融业能长期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创新式发展和规范化发展并举,不仅是因为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更关键的是金融系统长期坚持的员工培训教育制度,培养出一支具有高素质的高级人才队伍。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信阳市普遍开展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尤为重要,当前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新型金融组织,只有培养和引进相当一批金融专业人士参与,才能确保少出偏差,使其茁壮成长。

(作者系息县人民政府县长)

专家呼吁:在全国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金 济

成都市新津县袁山村村民袁福清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他拿着自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即“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明对记者说:“我们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和房屋,以前是既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也没有办法变现融资,如今有了这些证件不仅吃了定心丸,也有可能变现了。”

专家呼吁,应尽快总结成都、重庆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在全国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房产的物权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系列土地违法案件以“未批先用”为主要特点

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局长常嘉兴认为,目前用地审批环节多、周期长,效率低造成土地供应滞后于城市快速发展步伐,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承载力不足,也引发了以“未批先用”为主要特点的一系列土地违法案件。

在国家土地资源部两年前组织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活动中,仅东北三省就清理出“未批先用”土地11万余亩,占“未批先用、以租代征、违规建新区和扩区”三种违法违规用地面积的88%。安徽省芜湖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强伟介绍说,由于去年“扩大内需保增长”的需要,国土资源局曾一度有条件允许地方“未批先用、边用边报”,但这种模式不是长久之计,需要通过简化用地审批环节,再造用地审批流程,以适应并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趋势。

常嘉兴、强伟等国土部门的干部建议:一、简化审批环节,把现行的用地预审、农转用和土地征收三个环节简化为“转用许可”和“征收”两个环节。“转用许可”规定具体区位和数量限制,设定期限;期限内实际发生的流转、征收、供地均为有效许可;没有实际流转、征收、供地的部分期满失效,“许可”自动撤销。

二、优化各级政府审批事项和审查内容。国务院负责总量控制,基本农田、规模以上用地的“转用许可”,国家重点项目用地征收;省级政府负责其他用地“转用许可”,其他项目用地的征收审批;优化各级政府和国家部门“转用许可”和“征收”的审查内容,至于失地农民社保、多途径安置等“捆绑”于征地过程中的其他责任,应制定相关制度规范,交由地方政府执行,而从“转用许可”和“征收”程序中剔除。

三、规范审批程序,规定各个环节办结时间,提高中间环节效率,以稳定的、规范化程序来保证效率,一定要避免用地批件在中间某个环节压上数十天,上不下,下不知。四、根据国家、区域性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国土部门开展近、中期建设用地供需分析和需求预测,包括总量、结构和空间的分析、预测,对拟于近期储备、征收、使用的土地,事先查清宗地权属、利用现状、规划用途,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预估其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形成宗地或片区农转用、征收和供地预案。

农民希望得到物权化的农地使用权

8年前,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曾经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联合对我国17个省市农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0%左右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承包土地的转包权,7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承包土地的继承权,60%以上的村民认为户口外迁之后应该有权继续耕种。充分说明农民也希望得到其承包土地实实在在的权利,即物权化的农地使用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博士认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急速推进,“传统的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农村传统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居住模式和城

乡空间布局”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利界定,带有先天的易变、模糊与互相侵犯的惯性。“禁止土地流转则导致资料配置的效率低下;允许流转,其模糊的产权不仅为互相侵犯权益提供方便,也难以实现土地高效利用。所以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明确房屋、土地等农民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简称“沈阳督察局”)在分析近年来涉地信访和纠纷案件后也得出了“需尽快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的结论。沈阳督察局认为,有必要按照物权法的原则强化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权利的物权地位,使其成为在土地征收或流转过程中具有与新的土地使用者抗衡实力的对等一方,也有利于从内部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

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土地权属处处长孙建宏表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仅对维护农民权益非常重要,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也很明显。他说,通过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可以促进农民通过利用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实现增收,充分体现土地财产的市场价值。

尝试建立耕地保护新机制

在成都市温江区农民彭秀云家里,笔者看到了她与温江区政府签订的《耕地保护合同》,上面除载明耕地面积、地块数量、类型等基础信息外,还明确规定了其权利与义务。按合同约定,彭秀云不得自行或允许他人在耕地上建房、采石、取土、挖鱼塘等,不得闲置荒弃耕地,并负有对耕地破坏行为的制止、检举责任。如出现违约,政府有权责令其改正,若对耕地造成永久性破坏,将追缴全部耕地基金补贴,并进行相应处罚。彭秀云说,“家里现在有2亩地租给别人,我隔几天就要去瞅一下。他要是挖了沙或者盖了房,我就领不到耕保金了,那可不行!”

根据成都市统筹城乡委员会主任付毅的介绍,这种耕地保护新机制的具体做法是:按照基本农田每年400元/亩,一般耕地每年300元/亩的标准,由政府向拥有耕地的农户发放耕地保护补贴;补贴主要用于为农民购买农村养老保险;政府与农民签订《耕地保护合同》,农户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违约将被追回补偿款并承担相应处罚。更重要的是,如果耕地发生流转,耕保金的发放对象并不随之改变,以此激励农民主动监督耕地流转大户确保耕地使用性质不改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四川省成都市通过设立耕地保护基金,用以经济利益补偿和契约式管理的手段实现耕地保护的探索值得借鉴。他表示,应该建立一个与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形势相适应、能够激发地方和农民主动保护耕地积极性的耕地保护新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严格保护耕地的政策取向,为我国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安全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保证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平稳推进。但也应看到,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是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来贯彻耕地保护政策,不能激发地方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和GDP增长的冲动下,耕地红线受到冲击越来越大。

此外,芜湖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强伟还建议说,在现行的干部考评办法中,要将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提高到同等重要地位,有条件快速发展区域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重要的产粮区则应该突出耕地保护、耕地整理的考核指标,只要工作出成效,两种干部都要得到提拔重用,决不能再出现“认真执行国家土地政策但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干部被认为是缺乏改革魄力,而通过违法违规用地获得一时经济发展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的现象。

(据《经济参考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国内结构性转变和国际周期性调整双重挑战,从启动国内需求、构建和谐社

会、实现持续发展 的角度出发,人们有理由追问:新时期中国需要怎样的城镇化,才能有效回应外部冲击并形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线,农业工业化、农民民化和农村城镇化可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是在市场自发秩序拓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致同步的背景下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中的自发演化功能日益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地方政府主导、策动的特征。从客观效应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做大经济总量贡献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是引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显然,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增长绩效,但在产业选择、劳动流动和收益分配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产业选择偏差会降低就业创造能力,劳动流动受阻会抑制劳动配置效应,地价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祖祖辈辈特有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纷争与战乱中赖以生生不息的传家宝。而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了。于是乎,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出手阔绰的中国人,在种种国际会议上,开始有人质疑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现实让我矛盾:一方面,中国开始摆脱贫穷和匮乏,不仅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敢于担当,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中国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为萧条的世界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显示了普通中国人的购买力。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但这种骄傲和自豪是谨慎而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强,我们与真正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盲目乐观。未富固然不能先奢,就是将来有一天真的富甲天下,依然不能奢靡、奢侈、奢华,这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选择。

在走向富裕的起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重提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必须学会正

城镇化的未来走向

高 帆

分配失衡会降低农民财产收益,而城镇化的“涓滴”效应发挥会受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会渐趋拉大,居民消费能力和福利状况改善也会受到影响。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的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其发展取向无疑是正确的,而现有的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取向存在着偏差。如果说中国城镇化的基点是促使多数社会群体分享结构转化的红利,促使增长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话,那么地方政府主导、以GDP为目标且伴随着农村要素单向流出的城镇化就需要改进和完善。其改进方向也十分清晰,即更强调产业选择与发展时的市场演化 and 自发集聚,更强调农村劳动

力流转时的就业拉动和身份融合,更强调农民对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充分获取,市场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应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城镇化的理性选择。

从政策取向看,决策层既重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意识到现有城镇化进程面临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体现了对地方政府主导下城镇化低效率状况的积极回应;强调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和落户问题,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体现了对城镇化过程中流转农民融入问题的有效回应。

未来,为推进市场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的城镇化进程,我们应完善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淡化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直接规划冲动,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高行政效率,促使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进行产业选择,促使居民根据市

场信号进行空间集聚,这种基于市场演化而形成的城镇化将更具有效益和可持续性。应以改善商业环境为切入点为企业发展提供条件,特别应打破行业壁垒、降低融资成本、完善税负体制,借以促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持续增强城镇化中的企业集聚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应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民在流转中的报酬获取能力,促使农民职业流转和身份流转逐渐同步化,促使农民个人流转与直系家属流转逐渐同步化,以此解决农村流转人口的福利供给和城镇融入问题。应高度关注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的“边缘化”问题,在完善中央——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背景下,限定土地公益用途的范围,弱化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使开发者按照及时、足额等原则给予农民利益补偿。

(据《解放日报》)

未富不能先奢

朱铁志

确确调节俭生活与勤劳致富、正当消费与奢侈浮华、热心慈善与摆阔斗富的内在关系。以一种成熟理性的生活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世界。对于外界那种过高评价中国成就,过度渲染中国实力,过分夸大中国作用,过于强调中国责任的说法,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大物“薄”,人口众多,是这个基本国情的主要特征。资源匮乏使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巨大的分母,足以消解发展成就、放大发展困难。在不断开发新技术、新能源,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只能量米下锅,量入而出,在“节流”上下功夫。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 and 生活方式,而不是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的败家子作风。在我们这样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居世界百位之后的所谓发展中大国,奢侈品消费居然“荣膺”世界第一的趋势,绝不是我们的光

荣,而是一种令人汗颜的耻辱!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必须从遏制公款消费、反对形式主义做起。在当今中国,最大的浪费、最奢侈的消费、最令人瞠目的奢华不在个体消费,不在几个出国大款肤浅的摆阔斗富,而在公款消费,在各种名义的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中。其中的浪费和腐败大家耳熟能详,见怪不怪,不需我在此赘琐论证,每个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本账。由此引发的奢靡之风影响极坏,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腐蚀社会风气,毒化青少年心灵,是最大的腐蚀剂。此风不除,倡导发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就会沦为笑谈。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导向,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如今的中国社会,似乎大有一点笑贫不笑娼的变态味道。人人争说财富,个个热衷炒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早已成为过气的老调,而在消费的名义下是驾豪车,住豪宅,挥金如土,才是“成功人士”的物化标志,才是当代英雄应有的派头。问题在于,在城市奢华的背后,在所

(据《学习时报》)